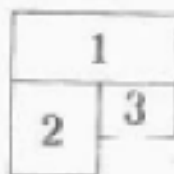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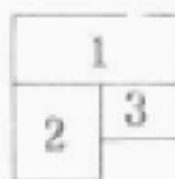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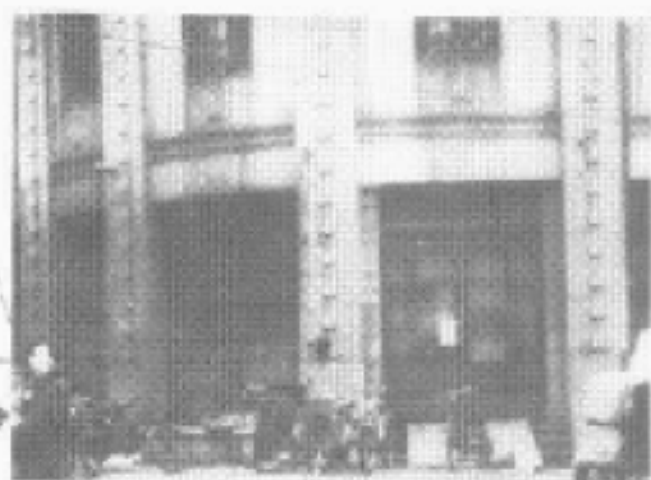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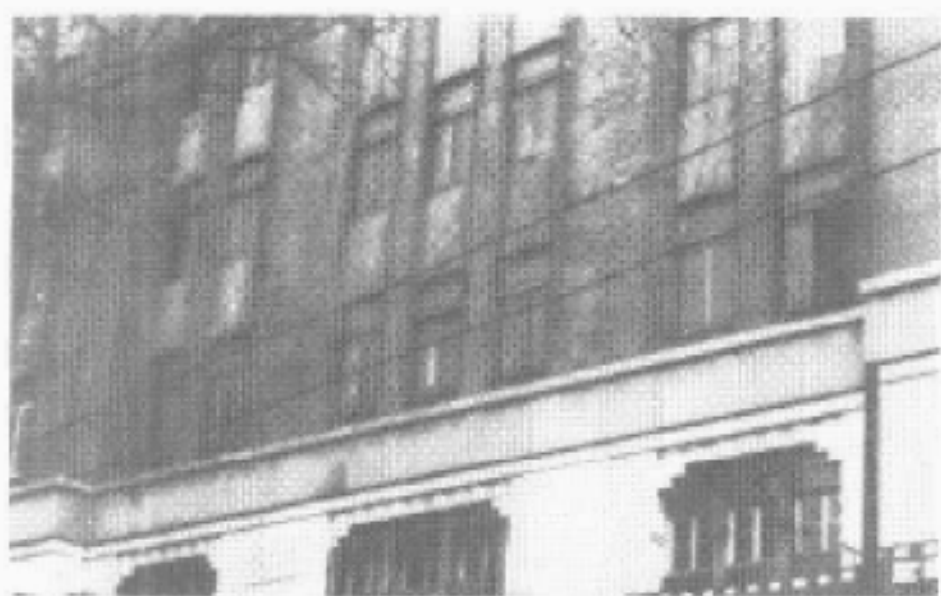
1949/37



①解放后江汉关职工在“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海关支部组织下，上街游行，欢庆解放（此照片陈列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②胜利街四雅路口的安利英大厦，解放后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南行政委员会先后设于此。

③解放后的武汉市人民政府设于此。（吉士摄影）



③胜利街扬子街口的和成银行  
解放前为我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主  
要的活动场所之一。(彭庶华摄影)

①原中央信托局，解放后中原  
临时人民政府商业部及中南军政委  
员会贸易部曾先后设于此。

②原汉口商业银行（今武汉图  
书馆），解放后中南财政部及中原  
财委曾设于此。

## 目 录

### 纪念武汉解放四十周年

|                          |                        |
|--------------------------|------------------------|
| 中共鄂中地委城工部在武汉的地下斗争·····   | 邱肱良 ( 1 )              |
| 在武汉地下工作的回忆·····          | 黄邦和 ( 27 )             |
| 回顾武大地下宣传活动·····          | 吴仲炎 ( 39 )             |
| 从和平运动到迎接解放·····          | 吴先铭 ( 50 )             |
| 解放前后的武汉工商界·····          | 王际清 ( 62 )             |
| 怀念赵忍安·····               | 张培刚 ( 71 )             |
| 解放前我的政治立场的转变·····        | 李崇淮 ( 76 )             |
| 先父胡慎仪在武汉解放前夕<br>·····    | 胡文林 胡文华 胡泳宜 胡伦彬 ( 80 ) |
| 欢迎解放军进入汉口·····           | 陈 七 ( 85 )             |
| 武昌解放亲历记·····             | 郑桓武 ( 90 )             |
| 汉阳城区解放纪实·····            | 杨春庭 ( 99 )             |
| 拂晓前的蓼山·····              | 郑忠银 ( 105 )            |
| 记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武昌执行处<br>····· | 张云冕 周家泉 ( 111 )        |

金圆券对人民的掠夺.....徐雪轩（118）

接管汉口地方法院的经过.....边征民（122）

武汉市青年文工团的前前后后

.....朱定和 文 质 周学南（127）

武汉解放初是怎样稳定物价的.....程 华（142）

回忆武昌县土地改革.....金 锋（146）

解放初期武汉劳资关系调整概况.....孙楚勋（149）

我在东西湖农场工作的五年.....冀晨曦（154）

武汉市第二医院的建立.....陈剑函（162）

再说武汉一师.....关云锦（166）

## 黎明前的战斗

——武汉解放大事记.....陈辉汉 王 逸 龚 长（180）

# 中共鄂中地委城工部 在武汉的地下斗争

邱肱良

---

**编者按：**邱肱良同志解放前任中共鄂中地委城市工作部部长，为开展武汉地下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里发表他的回忆录，原文近四万字，本刊限于篇幅，经商得他的同意，对其中1948年底城市工作转入新阶段以前的章节，多有忍痛割爱。惟其中活动人物，在新阶段也都有所记载，没有埋没他们的功绩。

---

武汉是华中重镇，地处全国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作好武汉的地下工作，对全国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解放战争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城市工作部，曾先后派遣人员到武汉开辟地下工作。

我是1945年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原来组织决定我去两湖开辟工作。1947年9月，我随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陈少敏找我谈话，讲述了当时的形势和加强国统区城市地下工作的重要性，并说组织上已考虑分配我搞城市工作，要我作好思想准备。1947年，中共江汉区党委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张箴任主任，军区副政委兼行署主任郑绍文和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宋侃夫兼任委员。1948年春，中原局调蔡书彬为区党委城工部长，张箴为副部长。军区挺进到平汉路西以后，郑绍文和宋侃夫等找我谈话，正式通知我到鄂中地委任城市工作委员会

主任（以后改称为城市工作部，我任部长），任务是对武汉开展城市地下工作。

当时武汉在白崇禧军事统治之下，岗哨林立，特务密布，形势非常严峻。我接受任务后，切实贯彻党在白区的工作路线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首先抓了组建地县两级城工部领导班子的工作，物色、配备了一批领导班子和派遣工作的骨干，于1948年3月相继建立了云孝、京应、天汉、天京潜四个县委城工部，并从1948年春起，即选派一批政治可靠，有城市地下工作经验，精干、灵活的人员进入武汉地区，开展地下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以鄂中解放区为依托，建立了从江汉解放区通往武汉和经武汉通往上海的多条地下交通线，秘密输送了投奔解放区的大批民主人士和知识青年，运进了我军急需的大批医药和电讯器材，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现将鄂中地委城工部在武汉地区的主要工作记叙如下：

### **打开地下城市工作的新局面**

1948年11月开始的淮海战役，大大加速了全国革命胜利进程和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全面崩溃，也为城市工作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此，我们的城市地下斗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总结前段组织准备情况，迎接新形势的到来，鄂中地委城工部于1948年冬，在天汉地区的张家湾召开了有各县委城工部长参加的城工会议。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长蔡书彬也到会指导，天汉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还在会上作了建立交通线的经验介绍。会议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晚上还围着短波收音机兴高彩烈地收听淮海前线频频传来的胜利喜讯。大家精神振奋，信心倍增，劲头十

足。会议在总结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围绕着如何迎接胜利的新形势、开展城市地下工作新局面这一中心，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策略方针上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新的革命形势十分有利，并将越来越有利于城市地下斗争的发展。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以解放区为依托，充分发挥解放区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以我党、我军的公开名义，放开手脚，开创新的工作局面。二，武汉的解放已经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我们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发动群众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不让溃退的敌军进行破坏，以直接配合我军渡江，解放武汉。三，根据城工工作的有利条件和特点，我们的工作重点应适时地转移到以上层人士为主要对象的策反、统战和情报工作方面来，以适应迅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四，在工作方法上，要及时改变我们在“长期埋伏”阶段所习惯的单线联系、个别发展的手工业工作方式，实行“普遍撒网，全面渗透，灵活运用，多头并进”的方针。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鄂中地委嗣后的城市工作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标志着鄂中地委的城市工作已达到了一个重要转折点，即由“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组织发展阶段进入到“抓紧时机，放开手脚，积极进攻，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新阶段。根据会议的指导思想，我们抓住大好时机，放开手脚，从以下几个方面迅速打开了城市地下工作的新局面。

### **第一，放开手脚，不断发展壮大城工队伍。**

首先，为了适应军事形势的迅猛发展，放手发展壮大我们的城工队伍。那时，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从敌占大城市奔向解放区，积极要求革命，要求学习。这是一支生气勃勃的革命力量。我们从中考察，挑选了一批有条件的学生，派遣出去工作。例如，天京潜县委城工部派出的傅平民，原是湖北省立一中的学生，在校时就参加了进步的读书小组活动，不满于国民党的腐

败，思想倾向进步。1948年12月，经过天京潜城工人员林先宁的介绍，进入解放区后，由我和林涯萍派回武汉开展工作。傅年纪轻，革命热情高，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很快地打开了工作局面。从1949年元月到武汉解放前夕，傅平民这条线经过层层串连，逐步发展的城工人员和城工关系达33人之多，并动员输送了五批大、中学生共19人到解放区。还有国师学生林晦安，被派回武汉以后，联络发展了杨步云、李庆云等20余人，动员输送青年学生约20人进解放区。又如，天汉县委城工部派出的金维诺，原是武昌艺专的学生，到解放区后由县委城工部长陆天虹派回武汉，经过亲串亲、友串友，发展了各种关系。除动员、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作文教界的团结工作外，他们的工作还渗透到了白崇禧办的汉口新制军事学校、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中统华中区办事处以及汉口义务消防总队等处。在这期间，云孝城工人员苏雨龙联系介绍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学生刘一龙、普奎到解放区，然后再由饶民太（副县长兼县委城工部长）派回武汉后，发展了汪海洲、徐昆等人，建立了城二小组，利用中央警校的同学关系，经过一段秘密串连，在武昌湖北省会警察局所属的8个分局、1个警察中队和汉口市警察局的两个分局和1个派出所的中、下层员警中，联系发展了17名城工关系，并在中央警校前后期同学中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天京潜城工部还通过在汉口的各种社会关系，广泛地发展城工关系。例如，天京潜县委城工部长林涯萍的族兄林厚周，是武汉知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亦有较多交往，他的夫人阮冰，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共青团，从事县妇女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虽与组织失去联系，但对党仍是有感情的。1948年冬，阮冰代表林厚周，按照城工部的布置，冒着风险，化装来到解放区城工部驻地，接受了我們布置的反搬迁、反破坏任务。林厚周夫妇接受任务后，不仅打消了原来打算把企业搬迁到港、台的计划，而且串连了国民

党军政界上层人士晏道刚、严敬、邬晓丹等人，积极开展了争取汉口市市长晏勋甫、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邬浩的活动。

## **第二，加强宣传攻势，进行政策攻心。**

此时，我们在组织上发展壮大城工队伍的同时，还特别加强了形势、政策的宣传工作。地委城工部资料组编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以及有关城市工商业政策等文件和各种宣传材料，通过交通线输送到武汉，由在汉的城工人员在群众和统战、策反对象中广泛散发。这些宣传材料和重要文件，一方面无情地揭露了敌人假和谈、真备战的反动面目，另一方面又坚决地宣传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到了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以后，为了配合我军解放武汉，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我们及时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资料组编印了大量的《新华电台特讯》、《工作导报》等宣传快报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入城“八条”）的传单，报导解放战争突飞猛进的形势，宣传我党我军入城政策和纪律，组织城工人员在汉广为散发。此外，京应城工人员胡安涛，以前导通讯社副社长徐鉴良的住宅为掩护，组织该社以周香奎、徐鉴良为首的一批人员，秘密收听我解放区电台广播，刻印了大量宣传品，秘密地进行张贴和散发。副主编周香奎和记者吴世勤、石嘉棣还利用前导通讯社的合法地位，采访发稿，揭露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欺骗、掠夺、镇压人民的反动本质，在新闻战线上有效地开展了对敌斗争。云孝城工人员何宜贵还利用湖北省通志馆为掩护，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工作团”的名义印发了《反南逃、反破坏口号报》及《告各界人民书》、《告公教人员书》、《告军、政、警、宪人员书》。刘一龙等还专门对警察局局员以上人员点名道姓地发出警告信、敦促信，展开了政策攻心。

**第三，以解放区为依托，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进一步发展城市地下工作的新局面。**

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在武汉的各个阶层中引起了极为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基本群众欢欣鼓舞，一批批青年学生纷纷奔向解放区，中间人士日益向我靠拢，国民党营垒出现较大的分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动摇恐慌，观望徘徊之中。有的人也在找出路、找桥搭。面对这种大好形势，我们因势利导，本着“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的方针，充分发挥解放区的优势，以我党我军的名义把我们派遣骨干所联系的重要对象请到解放区来，由我们亲自接谈，向他们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给他们布置任务。

当时任武汉大刚报社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的黄邦和来解放区接受任务（编者注：详见本辑黄邦和的文章，此处从略）。

我们通过“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还团结了一部分工商界的进步人士，成为我们开展反搬迁、反破坏斗争的得力助手。例如，天汉地下城工人员刘业成、陈厚安联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城工关系陈耀阶，是武汉硚口陈森记石膏行的老板，以后又和应城中山“夺锦堂”石膏矿的矿主合伙经营矿业，由于生产不景气，情绪消极。陆天虹除了布置刘业成、陈厚安做好陈耀阶的工作外，还派人专程把他请到城工部，由蔡书彬、陆天虹两位部长亲自接待。他们向陈讲明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国民党腐败没落、土崩瓦解的局面，党的工商政策以及老解放区民族工商业兴旺发达的前景，并动员他在武汉上层人士中多作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陈耀阶通过这次解放区之行，不仅打消了原来打算停办石膏矿的念头，还坚持在宁可赔本的情况下，把这个矿继续开办下去，维持了两三千矿工的生活。

为了更好地运用“请进来，派出去”的方法，我们还十分注意做好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的工作。由于这部分人过去的经历，他们和国民党当权的上层人物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彼此之间知心知底，信得过，谈得拢，谈得深，无戒备疑惧之心。因此，在做通、做好他们的工作之后，再派遣他们出去，通过现身说法来宣传我党政策，奏效较快，往往能够起到我们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例如，由傅平民一线联系的汉口《新湖北日报》编辑吴忠良，他的哥哥吴忠亚是武汉军校六期学生，曾任《新湖北日报》社副社长，湖北省政府考核委员会委员。1949年初，吴忠良由傅平民送进天京潜解放区后，由林涯萍和我以诚相待，多次和他长谈，反复阐述革命形势、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既定政策，并发展他为我城工人员，派回武汉工作。我们要他首先动员其兄吴忠亚留下来，利用其身分和社会关系进行策反工作。那时，吴忠亚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武汉解放指日可待，正处于去留难决的徘徊之中。当他亲自听到自己的弟弟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知道城工部领导对他的关切和期望之后，思想震动很大，感到前途有望，决心留下，靠拢人民，并利用其旧有的关系积极开展策反活动。

此外，京应县委城工部在争取国民党王家墩机场空军人员程德骥和国民党退役军官陈美邑的活动中，也把他们请到解放区参观学习，并分别由县委书记王家吉、城工部长王有学和地委城工部秘书长苏星接待，讲明形势，宣传政策，布置任务。

经过上述工作，到了1949年4月，我们对武汉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打入敌营内部、打入上层、打入敌军、打入敌特内部的策反工作有了重大的突破，各县的城工人员和城工关系已发展到800余人，遍布在武汉三镇的党、政、军、警、宪、特等部门和新闻、文教、交通、工商各界，以及一些工厂、学校。特别是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汉口市警察局、武昌省会警察局的上、中、下各个层次，都建立了工作关系，并把工作渗透到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部和武汉警备司令部。这样，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犹如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去“作战”那样，我们

在敌人心脏地带逐步组成了一支地下方面军，协同各方，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战斗。

### 反搬迁，反破坏

1949年4月，我四野大军挥师南下，挺进长江。为了对我军解放武汉相机作出策应和战术配合，粉碎白崇禧在弃城南逃前制造混乱、破坏城市的阴谋，鄂中地委城工部及时布置和组织城工人员投入反搬迁、反破坏、保护城市的战斗。我们的具体部署是：以群众斗争为基础，以策反、统战为重点，上下策应，左右配合，内外夹攻，多头并进，开展护校、护厂、护店、保护市政公共设施 and 机关文件档案，特别是维护“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以配合我军完整而有秩序地接管城市。

第一，紧紧抓住我军兵临城下的大好时机，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对国民党军、政、宪、警、特人员，特别是军政界上层头面人物，广泛地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

首先，我们把策反的重点放在“一府”、“两局”和“两司”方面，对“一府”、“两局”的各个部门和各层人员，采取多头并进、上下策应、全面渗透的方法进行策动。在这方面，我们和兄弟组织之间平行作业，互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在策略方针上保持一致，工作上相互默契，暗中配合，从而使整个策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对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的争取工作，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早在1949年2月，林厚周和他的夫人阮冰，按照我们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在国民党上层人士晏道刚（晏勋甫的叔父，曾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参谋长）、严敬（国民党中将师长）、邬晓丹（汉阳县参议会议长）等人的配合下，同晏勋甫进行实际的接触（当时，武汉市地下“民革”也

在对晏勋甫作争取工作)。开始,晏态度暧昧,对何去何从从不置可否。经过一段时间相互摸底、试探之后,林厚周夫妇利用他们与晏勋甫的同乡关系,采取请赴“家宴”的形式,以我党城工部的名义,向晏公开亮底,表明我们对晏的态度和政策。以后,晏的态度逐步转向明朗,接受了我们提出的三项要求:一是要保存好档案;二是要保护我们被捕同志;三是要防止白崇禧部队撤退时的破坏和骚乱。对于这些晏都同意照办,但他又表示,不发起义通电,态度有所保留。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乘飞机南逃,临行之际逼晏离汉。在此关键时刻,林厚周夫妇又会同晏道刚、严敬,将晏请到严敬家中,一起进行说服工作。此时,晏又出现反复。他提出不能留下的三点顾虑和困难:一是他“历任国民党的高官,罪恶深重”,耽心日后得不到人民的宽恕;二是他已在国库私自提出5000块银元,给家眷带到香港作为安家费用,这笔款日后怎么还?三是家眷在香港的生活没有接济,怎么办?这实际是要求政策兑现和解决经济问题。在政策问题上,林厚周代表我们作了明确答复,而且举了傅作义起义有功,作了较高安排的先例。至于经济问题,林当即向晏表示,由他负责解决。当天林即发电给他在台湾的大儿子林芳徽,要他设法以货折款,电汇了1000多美元到香港给晏的家属作生活费用。这样,晏终于被说服留下来。从5月15日夜至5月16日凌晨,林厚周通宵达旦地陪伴在晏的身旁,并代晏用电话命令汉口市政府所属机关及水电厂等重要单位的人员,坚守岗位,保护文件、档案,听候接管。晏勋甫的这一行动对安定人心,保护市府档案和国家财产以及维护武汉“真空时期”的社会秩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解放后,在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的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原汉口特别市政府全部档案和财产一一点交。晏被安排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参事室主任。林厚周被安排为武汉市商业局副局长。在争取晏勋甫的工作中,林厚周夫妇忠实地执行了党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

党所付托的重任，为武汉的和平解放和城市的完整接管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

在汉口特别市政府方面，我们还通过吴忠亚，利用黄埔军校同学以及多年知交的关系，经过一段宣传形势、政策攻心的工作，争取市府秘书长杨锦昱留了下来。

1949年4月，白崇禧下令汉口市府紧急进行疏散，并要把武汉的重要机器设备全部撤迁到桂林。杨锦昱及时向吴透露了这一消息，并共同商定由杨以市府秘书长身份，采取反复编制、修改预算，要经费，要车辆等办法拖延时间，致使白崇禧的搬迁计划未能得逞。

与此同时，天汉城工人员周良础、朱义山还在汉口市政府的中下层公务人员中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例如，他们通过市府社会科主任科员罗振，利用社会科管义务消防总队条件，布置消防队维护了汉口市区“真空”时期的社会秩序。又如市府打字员顾文华，是抗战时期就与我们有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她团结了一批市府公务人员，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斗争。另外，还通过大智区户籍警汪大荣，策动汉阳水警大队130多人枪留下等待接管。天汉城工人员刘业成、陈厚安一线，还和陈耀阶一起，策动原汉口武圣区副区长、汉口市参议会参议员李正己，串连了汉口两个区的区长和8个区（汉口市共有12个区）的副区长，投向人民，在保护区公所档案、枪枝、稳定人心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对湖北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的争取工作，是通过李逊夫去突破的。李逊夫虽出身于松滋县大地主家庭，但早年就参加了我党，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陈少敏曾率部队驻在其松滋家乡，由他打开家中粮仓供部队所用，对革命作过不少贡献。李和胡慎仪都是松滋县有名望的乡绅，早年又有同窗之谊。李于1946年以秘密党员身份来汉，取得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统战组史林峰的同

意,开始进行争取胡慎仪(当时任湖北省会警察局督察长)的工作。1948年秋,时局紧迫,省会警察总局长无人接任。湖北省府主席张笃伦多次征询胡的意见,胡有顾虑,怕当上局长,“将来共产党来了,脑袋要搬家”,一直拿不定主意,就找李逊夫商量。李对胡说:“警察局长不是不能当,只要当了警察局长不反对人民就好了。如果能为人民做好事,那就更好了。”胡接受了李的意见,接任了省会警察局局长,并决心投向人民。1949年3月,李逊夫到江汉解放区,向我谈了上述情况,并把胡慎仪这个关系交给我,同时介绍一个和胡慎仪关系较深的五师突围干部唐宗英(姓名记不太准确),安在胡慎仪身边,作为我和胡的联络人,由我直接掌握对胡慎仪的工作。当时,我们交给胡的任务是保存好警局的档案、枪支、弹药,特别要注意维持武昌“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武汉解放前几天,我和苏星又专派交通员黄鹏急送一封有关迎解工作的书面指示给他。对于这些他都一一照办了。解放后,他把省会警察局及其所属的12个分局的人员、档案、武器、弹药完整地交给了我军管部门。

在对省会警察局上层人物进行工作的同时,按照“多头并进,上下策应”的原则,云孝城工人员刘一龙等在武汉临近解放时,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广泛策动各警察分局所联系的员警,有领导、有计划地在所在分局,向警察局内坚持反动立场的顽固分子开展了一场反南逃、反破坏、反混乱的尖锐激烈的斗争。如省会警察局督察长倪治国、武昌四分局局长胡挥血(均系武汉大学“六一”惨案的凶手)多次密谋策划,在分局散布“共产党来了,当警察的都不好下地”的谰言,妄图煽动、裹胁该局员警携械南逃。5月14日下午,胡挥血正准备集合四分局警察行动时,我城工人员普奎(时任该局实习巡官),立即发动广大员警质问胡的行动有无总局指示,并提出生活上种种困难和要求进行抵制。与此同时,刘一龙还在四分局对面的一幢“公馆”楼房内指

挥已被我策动过来的另一分局警长和警士架起他们控制的一台机枪，严阵以待。这样才迫使胡挥血狼狈收场，放弃率众南逃的策划。解放后，胡挥血、倪治国等人都未能逃脱法网，先后被我镇压。5月16日至18日这段时间，刘一龙城工小组还布置所联系的分局和警察中队的人员广泛动员所在单位的员警，配合工人纠察队，积极维护武昌城区的社会治安，妥善保管户口档案、枪支、公共财产，听候接管。

在汉口特别市警察局上层方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吴忠亚作好保警总队长胡武的工作。胡武是汉口警局方面的实力派人物，保警总队约有1500余人枪掌握在他手中，是白崇禧拉拢裹胁南逃的主要对象。胡武的去留成为当时汉口警局内部南逃与反南逃斗争的焦点。吴忠亚与胡武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军校的同期同学，有长期交往的关系，相互之间无话不谈，彼此信赖。吴忠亚经过与胡武的多次交谈，申明大义，晓以利害，并以我城工部的名义反复强调我党的“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要胡丢掉对白崇禧的幻想，迷途知返，终于把胡武争取过来。5月上旬，白崇禧下令胡率部南撤，武汉警备司令刘觞许胡以师长名义，胡未为所动，采取拖延和兜圈子的办法，避过了白崇禧的裹胁，终于把队伍留了下来，并对鲁道源部队撤出汉口前进行破坏的计划和活动，作了抵制。5月16日上午汉口处于“真空时期”，李经世和胡武以汉口市警察局正副局长的名义联名发布了“四不准”的布告（不准抢劫公私财物；不准纠众暴动报复；不准乘机恐吓敲诈；不准破坏任何设备），亲自指挥、部署所部在汉口外围布岗放哨，四处巡逻，维持社会治安，制止国民党游杂部队窜入市区骚乱、破坏，成为我们“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一支积极力量。武汉解放后，胡将保警总队全部人员、枪支上交军管部门。胡的关系亦由我交给中南公安部卜盛光部长，转介二野有关部门派赴重庆工作。在那里，他在国民党军政界人士中积极进行活动，为西南的

解放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天汉方面的刘业成、金漪竹、陈厚安等在做好国民党少将军官左铎工作的基础上，又通过左作了胡武的工作，要他维持好社会秩序，保存好武器和档案，等待接管。天京潜方面的黄邦和联系了汉口市警察局督察长饶文治，通过饶争取了汉口七分局局长黄重白、十分局局长姚泽山、十四分局局长璩瑞投向我们，璩瑞并在该局实习巡官杜浚（云孝城工关系）的支持和协助下，制止了局内顽固分子妄图携械运粮南逃的策划。他们在保护档案和维持汉口地区“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蔡书彬部长直接派出和亲自掌握的城工干部刘建章（曾作过我们的交通员），在汉口市警察局和武昌省会警察局方面，进行过大量工作。他对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特别是对汉口警察局各分局的中下层骨干人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策反工作，在汉口警察系统组成了一支为我们控制、掌握的地下武装警察（重要骨干有六七十人之多，控制的员警近1000人）。这对于配合上层和兄弟单位的策反，控制整个汉口警局的局面，开展反搬迁、反逃跑、反破坏斗争，维护武汉解放“真空时期”的社会秩序，防止骚乱，迎接接管等方面都作出了成绩。刘建章是湖北荆门人，抗日时期就参加了革命，曾长期在家乡打游击，作基层政权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接受郑绍文、蔡书彬等指示，到武汉独立地开展地下工作，在工作中与有过许多联系和配合。令人痛惜的是他已于1980年不幸病故。但他艰苦卓著的业绩和毫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的。

对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路局局长邬浩和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我们都进行了工作。对邬浩的工作主要是通过林厚周和邬晓丹进行的，经过他们的工作，争取邬浩留了下来，